

引 言

事 出 有 因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友好或相互争斗的。有时友好，有时争斗，或既友好又争斗，或两者交替进行。拿破仑曾经说过，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认识和论断，尽管是从其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的，但有一定的道理。综观历史和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这样。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在对外关系中，都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相互之间关系的好或坏、冷或热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而转移的，都取决于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和在国际地位的提高。

本文以纪实的笔法记述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依我看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当利益发生碰撞时，是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分歧，还是推行大国主义、强权政治，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达损人利己之目的。回顾 40 多年来中苏关系友好—冲突—敌对—修好的过程，对于我们“以史为鉴”，推

动中俄之间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也许是有益的。

一、两个共产党执政的世界大国与邻国

在进入中苏关系的主题之前，有必要先对两国的基本特点以及影响双方关系的若干历史背景作简要的介绍。

中国和苏联都是世界大国。中国土地辽阔，面积 960 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2240 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口从新中国初期的 5 亿多人，增加到现在的 12 亿多人，占世界人口的 22%；苏联人口两亿七八千万，在世界人口中也排在前列。

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在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即开始执政。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执政。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又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两个最大的党，最有经验，最有影响。因此，中苏两党关系的状况不仅在两国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系中也举足轻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格局有重大影响。中苏两党之间团结一致或矛盾分歧或破裂对立，不仅严重影响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而且必然波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或友好或冷淡或恶化甚至敌对，不仅关系双方的利害，而

且涉及国际战略态势，令全球瞩目。

中苏两国毗邻而居。俗话说朋友可以选择，邻居难以改变。中苏两国约有 7200 公里长共同边界，是世界上拥有共同边界线最长的两个国家。边界两边的居民，有的是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信仰同一宗教；有的则是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有的长期友好相处，甚至是亲戚朋友；有的历史上就有隔阂，甚至还有仇隙，虽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不实行平等相待、互谅互让、睦邻友好的方针，而是采取大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必然会纠纷不断，以至发生武力冲突。

中苏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少。

二、不平等条约遗留的边界 ——中苏关系的一大悬案

中苏两国边界一直没有划定。历史上俄国曾经只是一个欧洲国家，早期领土只限于莫斯科城及其附近地区，同中国并不接壤。15 世纪中叶，它是蒙古金帐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统治下的一个封建小国，1480 年才摆脱蒙古人的统治。154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自称沙皇，然后不断向外扩张，1643 年入侵到松花江流域。1685 年、1686 年中俄两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败沙俄。1689 年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格尔必齐河、

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岭以北、河以西属俄国，岭以南、河以东至海属中国。这是中俄第一次公平合理地划分边界。1727年，中俄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那时中国西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同沙皇俄国相距甚远。

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俄国则逐渐成为封建帝国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沙皇俄国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既争夺又勾结，推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1858年，乘英、法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用武力迫使清朝当局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沙俄，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11月14日，沙皇俄国借助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藉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沙皇俄国还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10月7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沙皇俄国出兵强占中国伊犁，盘踞10年之久。1881年2月24日，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沙皇俄国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皇俄国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明确的论断，并严厉谴责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径。1858年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条约》一文中评论《中俄璦琿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

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同年，恩格斯在《俄国与远东的成功》一文中说：“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并不满足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他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列宁于 1900 年 12 月 24 日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中国的战争》一文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且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它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沙皇俄国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如在帕米尔地区，沙皇俄国违反 1884 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侵占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苏联时期，甚至某些一直在中国政府实际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也被划入苏联版图。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界河地段，苏联政府竟违反《中俄瑛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把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了中国岸边，有的甚至画到中国的内河和岛屿上，从而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 700 多个岛屿划去了 600 多个，面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主张废除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20 年 9 月 27 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1924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

规定：在双方商定的会议上，“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 1919 年和 1920 年两年苏俄政府各项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 1926 年举行了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两国疆界没有重新划定，两国没有签订平等新约，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实现。

于是，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两国关系中的一大悬案：总体关系好的时候，边界上相安无事，即使有事也易于解决；反之，则争端迭起，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导火线、催化剂。

三、《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新中国成立时中苏关系中另一个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与此相关的若干协定。这个条约是苏、美、英三国分割战后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的派生物，是蒋介石当局为换取苏联对其“合法性”的支持而出让国家某些主权的

1945年2月11日，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发表的公报，不仅确定了如何消灭德日法西斯的问题，而且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问题，如由英、美、苏、法分别占领和管制德国，解放后的欧洲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发起成立联合国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等等。美英为了减少在战争中的损失和牺牲，力促苏联尽快出兵对日作战。苏联就此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美英特别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别人、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同苏联达成《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通常所提的《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 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 3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斯大林
罗斯福
丘吉尔

雅尔塔公报和协定，实际上是划分二次大战后的势力范围，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为落实上述协议，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隐隐约约地转告蒋介石关于《雅尔塔协定》的事，并派霍普金斯为总统特使赴苏与斯大林进一步商谈。斯大林说：“外蒙古并不存在苏维埃制度，苏联也没有分裂中国的野心。苏联认为，蒋委员长为具有担任中国统一之资格的惟一领袖，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受东北的工作，也请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能在 7 月 1 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实行《雅尔塔协定》的协定。”杜鲁门一接到霍普金斯的报告便于 1945 年 6 月 9 日把正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宋子文请进白宫，把《雅尔塔协定》交给他并转达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谈话要点要他赶在 6 月 15 日转交蒋介石。宋子文匆匆乘机回到重庆，把前因后果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了宋子文的汇报，感到事态严重，但已生米煮成熟饭，无可奈何。他既要听从美国，又不敢得罪苏联，决定派宋子文、蒋经国、胡世泽、沈鸿烈等为代表于 1945 年 6 月 30 日赴苏谈判。谈判中彼此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但蒋介石迫于美英的压力，又出于战后一党掌权的需要和避免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占领东北和内蒙，便指示代表团向苏联让步；苏联也因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担心美国抢先占了便宜，为迅速

取得出兵中国东北的法律依据，也作了一些让步。于是，1945年8月14日双方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以及两个有关照会、《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所签订关于旅顺协定附件》。在斯大林、宋子文参加和主持下，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全权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分别签字。

条约和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此次在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从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

“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 同意在和平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 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 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 “ 独立之愿望” “ 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即以其现存之边界为界”。苏联政府声明：“ 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 日本军队驱逐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

至绥芬河及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缔约国同意上开铁路之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 为共同经营上开铁路起见，同意组设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 10 人组织之，其中 5 人由中国政府派任，5 人由苏联政府派任，理事会设在长春。”

“ 为管理经常事务起见，理事会委派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联人员中遴选，副局长一人，由华籍人员中遴选。”“ 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应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 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本协定期限定为 30 年，期满之后，中国长春铁路连同铁路之一切财产，均应无偿移转中华民国所有。”

“ 宣布大连为自由港 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

“ 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联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派充之，港口副主任应照上开手续在华籍人员中遴选派充之。”“ 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 中国政府应苏方之提请，以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 30 年。”

“ 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 缔约国同意旅顺口作为纯粹海军根据地，仅由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 关于上开海军根据地共同使用之事项，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之。该委员会由华籍代表二人，苏籍代表三人组织之 委员长由苏方派任 副委员长由中方派任。”上开海军根据

地之防务 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

这个条约和几个协定基本上是按《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的条款签订的。它有利于苏联出兵东北，加速日本的失败和投降。当时，中国共产党从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和维护战后的和平大局出发，对此大体上表示谅解和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但是这个条约和有关协定，实际上有损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当国民党政府垮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掌权后，是原封不动的继承这个条约及协定，还是加以修订或者另订新约，便成为中苏两国关系中急应解决的问题。

四、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 问题上的是非功过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

是结论。”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也在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苏联（1922年前称苏俄）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中国先进分子于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苏俄派了维金斯基、马林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以后又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才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全国的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二十几年的过程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中国革命，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地方。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现概述如下，以助理解。

（1）关于对共产国际的基本评价，他说：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1943年），3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讨论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当发生不同意见时，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道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

（2）关于第一个8年：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

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到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共产党。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1923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

(3) 关于第二个8年：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最大。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来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会。仓促通过。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務。斯大林在1927年，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

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11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指示来的。

中共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开的。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分，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分析。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实质上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这时，共产国际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1930年3月动身去共产国际。7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国内，6月11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

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 8 月 1 日、3 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9 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决议上写的不那么尖锐。

1930 年 10 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在 1932 年 1 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被取消了。1933 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 1933 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 100%，苏区力量损失 90%。当时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

(4) 关于第三个 8 年：共产国际的后期（1935~1943 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1935 年 7、8 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1937 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他打着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关系也好。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是这个时期比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少了。

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更多地相信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较少。相反地他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调到长城一带，配合苏军，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苏联东线的压力。毛泽东没有同意。

(5) 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斯大林直接同毛泽东联系，派人驻在延安。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当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斯大林来电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同

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若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

这些是历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有错误，特别是支持王明路线；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突破了苏共的预想而取得成功的，斯大林在高兴之余也不免对新中国排挤，打击毛泽东，对毛泽东将走什么样的路持有一定程度的疑虑。毛泽东对此是很有意见的，心情一直不愉快。